

耶律楚材诗中的陶渊明情结

傅秋爽

内容提要：耶律楚材，元朝开国元勋、千古流芳的一代名相。这样一个在历史舞台上活跃异常，充分施展了宏图大略的伟大政治家，在文化精神上，却远接中国隐逸之宗陶渊明。他将这位近千年前视仕途为畏途的诗人引为“知己”，创作了大量与陶渊明田园诗文化精神相契合的诗文。这个有趣的文化现象背后潜藏的是文化认同，反映出儒释道三者在不同社会历史和政治环境中的融通与变异。

关键词：元代 耶律楚材 陶渊明 诗歌

—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又号玉泉老人。契丹贵族，金末元初人，仕蒙古三十年，元太宗时期官至中书令。他的创作，表现出浓郁的陶渊明情结。自唐始，陶渊明越来越成为一种特殊文化符号。然而，就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样，陶渊明形象在每个历史时期被挖掘、凸显、强调、描绘出来的特征各不相同，无不涂抹着鲜明的时代色彩。人们受到所处社会环境、人文思潮、个人遭际的影响，对陶渊明的理解、认识也迥然相异。唐人看陶渊明，慨叹他诗酒人生的任真与狂放；宋人看陶渊明，敬重他高尚的人格和不仕二朝的气节；明人看陶渊明，赞赏他的清高与雅趣；清人看陶渊明集前人之大成，但更侧重的是以陶为文化旗帜进行自我标榜。而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时期，陶渊明的形象与影响如何，学界却很少深入论述。诚然，元人总体上对陶渊明的理论性探讨很少，但这并不意味着陶渊明在元代的实际影响就比唐宋元明等时期小。打开各种元代文集，陶渊明气息扑面而来，叹世、隐居、及时行乐、否定功名这些打着陶渊明鲜明烙印的思想随处可见。散曲中这样的主题占据了半壁江山，诗歌、散文、杂剧中同样的思想也充斥其间。应该说，陶渊明在元代影响更全面，深入而广泛，真正影响了一代人的生活。如此局面，与元代文学开创者、奠基人耶律楚材有密切关系。

耶律楚材是学界公认的元代文学奠基人和开拓者,他把陶渊明奉为知音。《湛然居士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开篇《和黄华老人题献陵吴氏成趣园诗》:“丁年彭泽解官去,傲游三径真三友。悠然把菊见南山,畅饮东篱醉重九。……知音谁听断弦琴,临风痛想纱巾酒。嗟乎世路声利人,不知曾忆渊明否。”^①耶律楚材一生创作,结集为《文集》十四卷,存诗六百余首,其中有相当的部分,表达了对陶渊明个人情操、人生选择和生活态度的认可,追慕归隐、恬淡、简约、任真、热爱自然的内容在其整个创作中占有相当的分量。这些诗歌,有些直接吟咏陶渊明、化用陶渊明诗句,更多的是在情调、意境、风格、内容等方面学陶或类陶。“归与不得效渊明,细碎功名误此生”(《寄武川摩诃院园明老人五首》其四)、“不如归去乐余龄……田园二顷忆渊明”(《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十首》其九)、“渊明幽隐掩柴关,琴已亡弦人亦闲”(《和景贤还书韵二首》其二)这样的内容,在《文集》中俯拾皆是,足见其并非一时兴起的漫然之作。耶律楚材与陶渊明在思想上高度契合,在感情上倾心亲近,在人生态度上相标榜,表现出浓郁的陶渊明情结。我们不妨暂且将其称为亲陶之作或干脆名为“亲陶诗”。

耶律楚材诗中亲陶的表达方式大体四种。第一种是直接提到陶渊明名号。如:“渊明”“陶令”,《文集》中共二十几处,对陶渊明的追慕之情毫不掩饰;第二种是借用带有特殊文化意味标签的物象。如“松”“菊”“柳”“鸟”“鱼”“酒”“东篱”“南山”“孤云”“幽径”“无弦琴”“桃花源”等来指代陶渊明,这样的情形多到数不胜数。例如《次韵黄华和同年九日诗十首》“当年别吾山,曾与黄华期,富贵非予志,卜筑临东篱。”第三种是引经据典指向陶渊明。很多时候是以陶渊明诗文如《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所描绘的意象入诗,例如《鼓琴》“何必寻弦指,忽两忘世事”就是化用陶渊明弹奏无弦琴的典故,描绘了物我两忘的境界和状态。而“读书一目下数行”(《用前韵感事二首》其二)则暗用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②的典故。第四种是诗歌中并没有出现陶渊明名号的字样,也没有直接引经据典或者使用陶诗意象,但所表现的思想、描绘的意境近似陶渊明。如:“他年共纳林泉下,茅屋松窗品正音”(《和李邦瑞韵二首》其一)的悠然画面。又如“寂寞河中府,临流结草庐。开樽倾美酒,掷网得新鱼。有客同联句,无人独看书。”(《西域河中十吟》其二)、“南岸独垂钓,西畴自省耕。为人但知足,何处不安生。”(《西域河中十吟》其五)这些描绘的虽然是西域生活场景,却颇有陶渊明武陵桃花源安乐和平的风致,可算是异域陶境了。这四种表达方式有时独立存在,但更多的时候往往交叉使用,且频率极高。例如《和黄华老人题献陵吴氏

① 耶律楚材:《和黄华老人题献陵吴氏成趣园诗》,《湛然居士文集》卷一,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下文征引耶律楚材诗文,皆出此版本,仅随文标注题目,不再另注。

② 《陶渊明集》,逯钦立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87页。下文征引陶渊明诗文,皆出此版本,仅随文标注题目,不再另注。

成趣园诗》：“丁年彭泽解官去，遨游三径真三友。悠然把菊见南山，畅饮东篱醉重九。献陵吴氏治荒园，成趣为名良可取。养高不肯事王侯，闲卧林泉了衰朽。今年扈从过秦川，可怜尚有萧条柳。归计甘输吴子先，丽词已后黄华手。知音谁听断弦琴，临风痛想纱巾酒。嗟乎世路声利人，不知曾忆渊明否？”在极短篇幅中，就有“彭泽解官”“遨游三径”“悠然把菊”“治荒园”“见南山”“游东篱”“醉重九”“畅饮”“养高”“不事王侯”“闲卧林泉”“知音”“断弦琴”“治荒园”“酒”“柳”等等以及“虎溪三笑”等典故共计二十多处，处处融入了陶渊明的文化意象。又如其所作“何日解官归旧隐，满园松菊小菴清”（《过天城和靳泽民韵》）、“白雁来时思北阙，黄花开日忆东篱”（《思亲有感二首》其二）等等，简直达到了陶诗印痕无处不在的地步。由此可见耶律楚材对陶渊明的推崇与痴迷到了何种程度。

耶律楚材不仅感情上亲近陶渊明，在创作上也学习陶渊明。袁行霈在《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①一文中，将陶诗的主题创新分为四类：第一，表现归隐主题；第二，表现饮酒主题；第三，表现固穷安贫主题；第四，表现生死主题。耶律楚材的亲陶之作几乎继承了陶诗创新主题全部内容：归隐主题以一贯之，饮酒主题偶尔为之，安贫乐道的内容随处可见，对生老病死富贵功名更有着深刻审视与沉思。内容丰富，感情也更为复杂。

二

一般而言，处于相同或相近的社会阶层，有着相近经历的人似乎更能相互理解彼此欣赏，文学上更是如此。然而吊诡的是，自称陶渊明知己的耶律楚材事实上与他所崇拜的陶渊明有着巨大的差异。耶律楚材生长北国出身显贵，是正宗的皇亲国戚，陶渊明长于南方是家道中落的寒门百姓；耶律楚材为开国重臣，庙堂廊柱，陶渊明是只做过几天卑微小吏沉沦社会底层的一介草民；耶律楚材一生叱咤风云，是指点江山的政治家，陶渊明是远离官场耕读为业的柔弱文士；耶律楚材是以济世泽民传承文化为己任的契丹贵族，陶渊明是洁身自好诗酒自娱的汉族隐士；耶律楚材出西域风云际会，入都城高居相位，陶渊明一生大多时间衣食不周，长期栖居山野……并且，元代相去东晋，相距近千年。从地域文化，到人文风俗；从皇权统治，到社会结构；从经济状态，到文化思潮；从官场生态，到人文追求，所有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什么使得耶律楚材对陶渊明心心念念，奉为知音，表现出不同寻常的亲近？之间的脉络联系在哪里？这个特殊有趣的文化现象实在值得深入思考探讨，因为其间隐藏着中华文化久远传承、广泛传播的基因和密码。

能够超越差异，彼此相互认同结为知己的唯一的纽带就是共同的文化根基。而文化接受

^① 袁行霈：《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的渠道包括家族传统、后天教育、经典阅读、宗教熏陶、文学启示等。耶律楚材对陶渊明所表现出来的浓厚情结清晰地标明了这点。

陶渊明(约 365—427),字元亮,又名潜,号五柳先生,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一生足迹不出本州。曾祖陶侃为晋大司马,被封为“长沙郡公”;祖父陶茂作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也曾任太守县令一类的小官员;而他的外祖父是著名的名士,曾在桓温手下做过参军。所以陶渊明这代尽管家道中落,但名义上还算官宦之后,享有布衣百姓所没有的荣耀,虽无实际利益,但对一个人的志向和人生定位无疑还是会产生影响,所以陶渊明出仕符合原本的生活轨迹。耶律楚材生于金都燕京(今北京),是正宗的“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出身契丹贵族家庭,身为辽太祖阿保机的第九世孙,本人又是金朝贵族,世代尊贵、显赫,地位极高。但最令他骄傲自豪的却是家学渊源深厚。其八世祖耶律倍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聪敏好学,多才多艺,富于汉文化修养,不仅孔武有力,而且擅长诗歌。《辽史》卷七十二记载:“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①耶律倍不仅本人是遵循儒家传统道德的典范,而且极有远见,还是儒学汉文化的积极推行者。正是由于他的建议,辽朝才将孔子放在敬祀首位,从此辽历代君主无不尊儒重文,世代传承,在契丹上层蔚然成风。耶律楚材对这位先祖尊崇有加,时时颂扬:“辽家遵汉制,孔教祖宣尼。焕若文章备,康哉政事熙。”(《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耶律楚材的父亲耶律履“通六经百家之书”“弱冠已卓立”,为金朝尚书左丞相。耶律楚材和陶渊明一样都是幼年失怙,由母亲教养成长。陶渊明九岁丧父,与母亲、妹妹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耶律楚材三岁丧父,由出身显贵且文化底蕴极为深厚的母亲杨氏教养。万幸的是,两个家庭都具备博览群书的条件,受家族影响,他们都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确立了以儒学为宗、兼备诸家之长的文化思想根基。陶渊明外祖父家藏书甚丰,他涉猎广泛,在时人皆以《庄》《老》为宗而远儒学的两晋,他不仅读庄、老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而且更潜心研读儒家经典“六经”和文史,确立了以儒学为宗的文化根基。青年时期,又受到佛学高僧慧远大师的影响,因而思想中融合了儒、释、道三种文化精华。陶渊明《饮酒二十首》第十六首中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这无疑是儒家思想;《归园田居五首》第一首又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向往无拘无束返璞归真的俭朴生活,显然是受道家影响;陶渊明虽然没有正式皈依信奉佛教,但是他的诗歌中反映出浓厚的佛教空观思想:“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故园田居五首》之四)。耶律楚材秉承家族传统,精通汉文,自幼学习经典文籍,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后来他又正式皈依佛门,投在金元之际最著名的大德高僧万松行秀门下,“杜绝人迹,屏斥家务,虽祁

① 脱脱等撰《辽史》卷七十二《耶律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09页。

寒大暑,无日不参,焚膏继晷,废寝忘餐者几三年。”(《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序》)这段潜心修行的经历,对耶律楚材一生思想、行为和创作影响重大。

在仕途与功绩方面,耶律楚材与陶渊明有很大不同。陶渊明生逢乱世,仕途蹭蹬,到三十岁才短暂出仕,做过江州祭酒等职位低卑的小官,后又在镇军将军刘裕和建威将军刘敬宣处任参军,最后做彭泽县令,在职仅仅八十余天,便毅然辞官归隐,留下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美誉。而耶律楚材与之大不相同,起点很高,官运不错,大有作为。他生当金元易代之际。17岁时,以“宰相子例试补省掾”的成例出仕金朝,蒙古军队攻占中都(今北京)时,25岁的耶律楚材作为金留守尚书省左右员外郎驻守中都,始终恪尽职守。中都失陷后,公元1218年春,由于得到成吉思汗赏识,他开始了三十年出仕新朝的岁月,成为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期最有作为的政治家。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秩序建立和税制改革诸方面都卓有建树。政治上,在他的劝谏下,蒙古统治者结束了裂土分民制度,转为适于农耕发展的封建管理制度;实行了财、政、军三足鼎立分治,遏制了地方分权势力的恶性膨胀;法律上,对蒙古习惯法中有关难民、罪犯、俘虏、屠城等诸多法规进行了改革,使无数人受益避免了杀身之祸,仅躲避在汴梁城逃避兵祸的百姓就有一百四十七万人因他得以逃生;制度上,括户口籍为编民,便于管理;经济上,统一课税,制定了永额赋税,将蒙古政权真正纳入封建轨道。同时他对于汉文化的保护更是不遗余力,使儒学地位有所恢复。

在人生出处方面,耶律楚材与陶渊明的差异似乎更大。陶渊明所处魏晋时期,权争剧烈,战乱频仍,到处充满阴谋、篡逆与残杀,生灵涂炭,恐怖遍布。稍不留神,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受杀戮。与陶渊明同期的著名文士如:何晏、嵇康、张华、陆机、郭象、潘岳、刘琨等,都因为卷入政治漩涡而遭致杀身横祸。值此乱世,纵有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支撑,以陶渊明的身分、地位和政治能力要想政治上有所作为也不现实,反而极有可能阴差阳错丢了性命。虽然他数度辞官又数度出仕,虽然他在一系列“金刚怒目”式的作品如《咏荆轲》《述酒》《饮酒》《读山海经》《拟古》《杂诗》《咏贫士》等诗歌中反复吟唱述说自己鸿鹄之志,如在《杂诗十二首》第五首说:“忆我少壮时,无欢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在《拟古九首》第八首中又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但事实上他对现实始终保持着一份冷静,《联句》诗云:“念彼穷居士,如何不叹息,虽欲腾九万,扶摇竟何力?”他清醒地意识到在他所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门阀森严的两晋时代,以他自身的条件,这些大鹏展翅的理想都只是空想,无法践行,通过出仕来实现政治理想根本不可能。陶渊明出仕更直接原因就是为了解决一家老小的吃饭穿衣等现实困难。第一次出仕是因为“亲老家贫”,上有高堂老母需要他赡养,最后一次出仕是因为“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几个孩子嗷嗷待哺,因而他的为官更多的出自现实

生活压力的无奈。处乱世危机四伏而无力抗争,居官场却不肯同流合污丧天良,远红尘而高堂稚子却无以为养,这份无奈与纠结是千载以来大多数在仕与不仕之间彷徨的士人们所共同面临的人生难解之题。面对“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感士不遇赋》)的政治环境,为免遭不测只能“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宁愿挨冻受饿也只能趋利避害选择归隐。陶渊明的出色之处其实不在他的归隐,而在于他真实表达了“纠结—痛苦—释然”的心路历程,他给归隐找到了冠冕堂皇而又符合人性本真的理由,而且在艰苦的隐居生活中发掘出了人生的诸多乐趣,并将其不断诗性化,通过文学表现,使之呈现出别样的审美意趣,给苦难的人生增添了可供赏读的愉悦。仕途失意者们理解他的明智、清醒与选择,称许他的洒脱、率真、淡泊与洁身自好,将他视为智者、达人,仕途上失意者不绝于旅,世世代代追随者便络绎不绝。

三

但是,看似光鲜亮丽的耶律楚材,为什么偏偏对沉浮下层的陶渊明怀有挥之不去的特殊情结?认真分析,这一切恰恰与他显赫的出身以及现实的际遇有着深刻的渊源。耶律楚材身世显赫,先辈们都是曾经主宰过国家命运、历史进程的人物,这决定了他对自己的期许也不平凡。首先,他所处的时代与陶渊明不同。金元易代之际与东晋无序的乱世不同,表面上看也是动荡、变革,也是征伐、杀戮,但是这些残暴的背后却是改朝换代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耶律楚材熟读史书,能够理解王朝兴亡更迭乃是必然。事实上,无论是他任职的金朝,还是苟且江南的南宋,都已腐朽透顶,被元替代乃大势所趋。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一统天下的伟业,也已展现出无比辉煌的前景。耶律楚材诗中不止一次表达了对全新纪元到来的激情与赞叹:“天纵吾君大圣人,天兵所指弥烟尘。三齐电扫何须郦,六国雷驱不用秦。”(《过天德和王辅之四首》其一)耶律楚材将其视为实现政治抱负千载难逢的大好契机。《元史》本传记载,其父“通术数”,早在他幼时就曾私下里对人说:“此子(指耶律楚材)吾家千里驹也,他日必成伟器,且当为异国用。”^①于是借《左氏春秋》“楚虽有材,晋实用之”^②为老年所得爱子命名,希望他能“楚材晋用”,在未来新政权那里能够大有作为。楚材之父甚有远见,楚材本人必也以此为期许,认为值此革旧鼎新之际,尽可将平生所学孔孟之道尧舜之德,通过辅佐蒙元新君使得仁政遍及四海,惠及天下苍生。《用前韵送王君玉西征二首》其二:“关山险僻重复重,西门雪耻须豪雄。定远奇功正今日,车书混一华夷通。”他认为:“君子之学道也,非为己也。吾君

① 宋濂等《耶律楚材传》,《元史》卷一百四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891页。

②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20页。

尧舜之君，吾民尧舜之民，此其志也，使一夫一妇不被尧、舜之泽，君子耻诸。”（《贫乐庵记》）但实现理想的道路如此艰难。元代统治者作为马背民族，统治和管理国家的观念简单、粗陋，与耶律楚材心目中理想的礼乐文化格格不入，文化的巨大反差和冲突，使他纵有千般治国良策，也常常陷入被误解、陷害、围攻的艰难境地。郝经《立政议》言：“耶律楚材为相，定赋税，立造作，榷宣课，分郡县，籍户口，理狱讼，别军民，设科举，推恩肆赦，方有志于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设隙抵罅，相与排摈，百计攻讦，乘宫闱犹豫之际，恣为矫诬，卒使楚材愤悒以死。”^①这些艰难的经历和难言的苦痛在他的诗中时有流露：“边城十载绝知音，琴断七弦鹤亦死”（《和南质张学士敏之见赠七首》）。由此可知他坚守王道的艰辛。满腹经纶无人欣赏，壮志凌云不被理解，孤独凄凉不被重用，饱受排挤、诬陷、攻讦，困境中备受挫折的耶律楚材不止一次想到了归隐。在《冬夜弹琴颇有所得，乱道拙语三十韵以遗犹子兰并序》中耶律楚材直白地道出了自己对官场生活的厌倦和对本真生活的向往：“我本嗜疏懒，富贵如桎梏。幸遇万松师，一悟消三毒。早晚挂冠去，闾山结茅屋。蔬笋粗充庖，粗饭炊脱粟。有我春雷子，岂惮食无肉。旦夕饱纯音，便是平生足。”事实上“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先辈们曾富有天下尊贵之极的耶律楚材，对荣华富贵看得比一般人要透彻、冷静、淡然的多。祖辈，经历了辽为金所灭，而他，又亲历了金为蒙元所灭。身为辽国帝王之后，又曾是金朝贵族和官员，耶律楚材在思想感情上实际已经经历了两度亡国、亡家的煎熬，所以他诗中常常表现出对人生和世事强烈的虚幻感。《赠侄正卿》中“辽室东丹九叶芳，曾陪佩剑侍明昌……兴废人间战白蚁，荣枯枕上梦黄粱。”人生如梦，兴废瞬间，世上还有什么值得执着不放？然而素志未酬，不得不滞于仕途，在他，对理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已成为一种深入骨髓不可更改的信念。与陶渊明相比，耶律楚材在政治远见和历史的责任感、使命感方面都要强烈得多。而在个性上，更是具有超强的隐忍度。所谓“隐忍”，其实就是坚定、坚决、勇敢、坚强、坚毅，懂得变通但百折不挠，有一种舍身忘我的牺牲精神。如此境况下的耶律楚材一方面积极用世，另一方面就只能借着佛道自我解脱。在谈到儒、佛二者的关系时，他主张“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又云：“穷理尽性莫尚佛法，济世安民无如孔教。用我则行宣尼之常道，舍我则乐释氏之真如，何为不可也。”（《寄用之侍郎》）概括起来，就是“以佛治心，以儒治国”。如此，面对困境与险阻，面对幻灭与痛苦，才能支撑他继续在追求礼乐理想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但期圣德泽天下，敢惜余生寄海涯”（《还燕和美德明一首》）、“从他抹粉施朱，一任安名立字”（《自赞》），他就像一个信念坚定意志顽强的虔诚信徒，跋涉在追求理想的征途上，自有一种悲壮的崇高之美。

① 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十二《立政议》，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46页。

四

悲壮崇高的耶律楚材对明智、洒脱、任真、率性的陶渊明却存有惺惺相惜的深刻理解。在《和裴子法韵》序中,系统地表达了对陶渊明的认识:

顷观子法跋:石《白莲社图》,斥渊明攻乎异端。吾子不惑所学,主张名教,真韩孟之俦亚也。昔巢、由避天下而远遁,尧、舜受天下而不辞,以致泽施于万世,名垂于无穷。是知“洁己”“治天下”各有所安耳。夫清虚玄默,乐天真而自适者也;焦劳忧勤,济苍生为己任者也。二道相反,甚于冰炭。使尧、舜、巢、由异地则皆然。后之世,乱臣贼子窥伺神器,狐媚孤儿寡妇扼其喉以取天下者,闻巢、由之风,亦少知愧矣。然则巢、由之功岂可少哉!弃享天下之大乐,而且希物外之虚名者,岂人情也耶!文中子有言:“虚玄起而晋室亡,斯岂庄老之罪欤?”盖用之不得其宜也!以虚玄之道治天下,其犹祛寒御单葛,大厦服重裘,自底弊亡,岂裘葛之罪哉!昔晋武一统之始,不为后世之远谋,何曾已识之?既而祸难继作,骨肉相残,屠戮忠良,进用谗佞,虽元凯复生,亦不能善其后矣。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支,独渊明能救其弊哉!适丁天地不交,万物不道,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之时,渊明见机而作,挂印绶而归,结社同志,安林泉之乐,较之噪进苟容于小人之侧者,何啻九牛毛耶?以渊明之才德,假使生于尧、舜、汤、武之世,又安知不兴皋、夔、伊、周并驱争先哉!宣尼有云“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又云“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斯亦名教之内,昭昭可考者也。何责渊明之深也?余尝谓否则卷而怀之,以简易之道治一心;则达扩而充之,以仁义之道泽四海,实古今之通谊。^①

耶律楚材理解陶渊明的退隐是时代使然,因为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指出在隐者巢由和圣者尧舜之间是没有本质区别,“洁己”与“治天下”之间不过是各有所安。假设陶渊明生于尧舜汤武那样圣明之君当政的时代,他本可有所作为,成为“泽施于万世,名垂于无穷”以“济苍生为己任”的积极用世者,反之亦然。在耶律楚材看来,选择隐与仕关键在时代,而无论是任何时代,做任何选择,做人最重要的根本还是在一个“正”,有了这个“正”字,则可以舒卷自如,进退从容。“否则卷而怀之,以简易之道治一心;达则扩而充之,以仁义之道泽四海。”耶律楚材序文中句句说陶,实际字字都是在阐释自己。于此,耶律楚材心中浓郁的陶渊明情结也

^①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一,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页。

就找到了出处。

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中说,耶律楚材“于禅学所得最深,然其所用以佐蒙古安天下者皆儒术也。公对儒者则唱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之说。而《寄万松老人书》则又自谓此语为行权。然予谓致《万松》一书亦未始非公之行权也。公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实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绝未见有此种气象。古所谓墨名而行儒者,公之谓欤!”^①正是这种“以天下生民为己任”的毅然,使得耶律楚材在气象上更为恢弘,达到了古今难以企及的人生高度。

行为尊孔孟,思想近佛老,就是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积极付诸行动,顽强进取;在遭遇挫折理想难以实现时,又能从容豁达,坦然面对失败。二者相辅相成,对应辩证。耶律楚材对陶渊明的高度认可正是基于此。没有孔孟激励,难以成就一生伟业,同样,没有庄老慰藉,他难以忍受官场上长期的心灵煎熬,或许会像屈原投江走向毁灭。同样,陶渊明如果只有佛道庄老,而缺乏孔孟根基,那么他也难以如此丰富深厚,恐怕早已与同时代的那些谈玄论道之人一样湮灭于历史尘埃随风散去了。我们从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可以窥见其千回百转的心迹历程:“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淳源汨以长分,美恶作以异途。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间。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嗟乎!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琬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可见,在陶渊明心中,并非如庄老一般消弭了善恶美丑,他依然希望能够实现孔孟忠孝君亲的理想,无奈生不逢时,所以只有归隐自保,在乡间田亩中播撒忠孝信义的种子。值得注意的是,在“雷同毁异,物恶其上”乱世中,“推诚心”“不矫然”“怀琬”“握兰”“芳洁”的存“真”,显然都有浓郁的庄老意味。事实上,儒学也并非一味地进而无退。在儒家经典《论语》中就记录了孔子许多有关隐逸的言论。例如:“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②、“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论语·泰伯》),又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而且还记载了伯夷、叔齐、柳下惠、长沮、桀溺等隐士的事迹,即使是孔子本人也曾动过“子欲居九夷”(《论语·子罕》)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念头。孟子也强调应该“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③可见古代圣贤们在进退仕隐两种选择上原本就都是可互济互通的。

① 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王国维先生全集》续编三,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第907页。

②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4页。下文征引《论语》,皆出此版本,仅随文标注题目,不再另注。

③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81页。

言与行上,陶渊明是儒释道三者高度杂糅并使之和谐统一的践行者。而耶律楚材对三者关系思考甚深,且多次进行理论性表述。在《题西庵归一堂》中他说:“三圣真元本自同,随时应物立宗风。道儒表里明坟典,佛祖权宜透色空。曲士寡闻能异议,达人大观解相融。”在《过太原南阳镇题紫薇观壁三首》又说:“三教根源本自同,愚人迷执强西东”。在《寄赵元帅书》中耶律楚材进一步指出三教之用,“吾夫子之道治天下,老氏之道养性,释氏之道修心,此古今之通义也。舍此以往,皆异端耳。”在《寄用之侍郎序》又指出其分别效用“予谓穷理尽性莫尚佛法,济世安民无如孔教,用我则行宣尼之常道,舍我则乐释氏之真如,何为不可也?”他又在《释奠》一诗中写道:“宣父素心施有政,能仁深意契无生,儒流释子无相讽,礼乐因缘尽假名。”认为儒家的仁学学说与佛家的“无生”之说可以相融互济。

《文心雕龙·知音》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又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覩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①刘勰提出了文学史上千载知音的观念,认为虽然“世远莫见其面”,但因为前世的真诚深厚,使得后世能够“沿波讨源”“见其心”。这里的“幽”与“深”所指,原本就是隐藏于作家内心深处并表现在作品中的文化底蕴,唯有深刻的文化认同,才能使得浩如烟海相隔千年的人成为知音。一个作家,选择什么样的人去喜爱,就说明他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与之有着高度的一致。耶律楚材心寄陶渊明,奉为知己,在于二人根脉皆出于对儒释道宏旨的坚守与融通。

(傅秋爽,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吴 刚】

^① 刘勰:《文心雕龙》,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6页。